



周天勇：我对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及其对策的一些看法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感谢新供给研究院的邀请来分享我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和观点。刚才听了贾康首席、加宁教授、晓河院长三位的发言深受启发，我的观点是要恢复和支撑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有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支撑增长速度的看法，有要加大财政赤字货币政策来恢复经济增长的建议。当然，我不是绝对否定这些，这些可能都需要，但是，我的看法，要将速度恢复了稳定住，重要可能需要大力度的第四次市场化改革。



一、中国未来年均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是 2.2%左右

1957-1977 年，GDP 年均增长速度为 5%。抽入方面，就业劳动力年

平均增长 2.6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年平均 42%，但有效资本增长率年均 为 7.5%，劳动与资本替代系数大体为 0.3 和 0.7，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1.21%。

1957—2037增长速度：历史数据与未来判断				
投入和增长	1957-1977 自然增长	1978-2021 改革开放	1978-2021 自然增长	2023-2037 自然增长
就业投入增 长 (%)	2.64	1.47	1.47	-1.12
资本投入增 长 (%)	42.15	14.51	14.51	3.92
资本形成增长%	10	15	5	?
GDP增长 (%)	5.0	9.24	3.76	2.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团队核算与仿真。未来为中速。				

改革开放以后，就业到 2021 年为止，GDP 年均增长 9.24%。投入要素投入方面，就业劳动力平均增长 1.4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年均 下降到 14.1%了，但有效资本年均增长率为 9.07%，劳动与资本的替代系 数分别为 0.4 和 0.6，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在 0.8%左右。

未来增长推算，最基本的算式是索洛模型。以此简单匡算，2023 到 2037 年间，GDP 年均增长速度也就 2.2%左右。理由是，投入方面劳动力 年均增长-1.1%已经是一个基本确定的数据，资本增长根据人口变化和老龄 化情况，年均增长可能为 4%左右，未来我们提高劳动贡献比，资本边际产

出率会下降，平均替代系数如果为 0.5 和 0.5，则要素投入产出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也就 1.45 左右，假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会增长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水平一样，为 0.7%。

国内学界和大部分人士，对此计算结果都有疑问，为什么预测这么低？我在大学十及博士学的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供给侧的生产增长模型。我觉得这是一个体制既定，在市场经济情况下的一个增长函数，这个算式仿真和推演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有误。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机构，包括最近日本的一个研究机构对中国未来增长速度看低，与这种算式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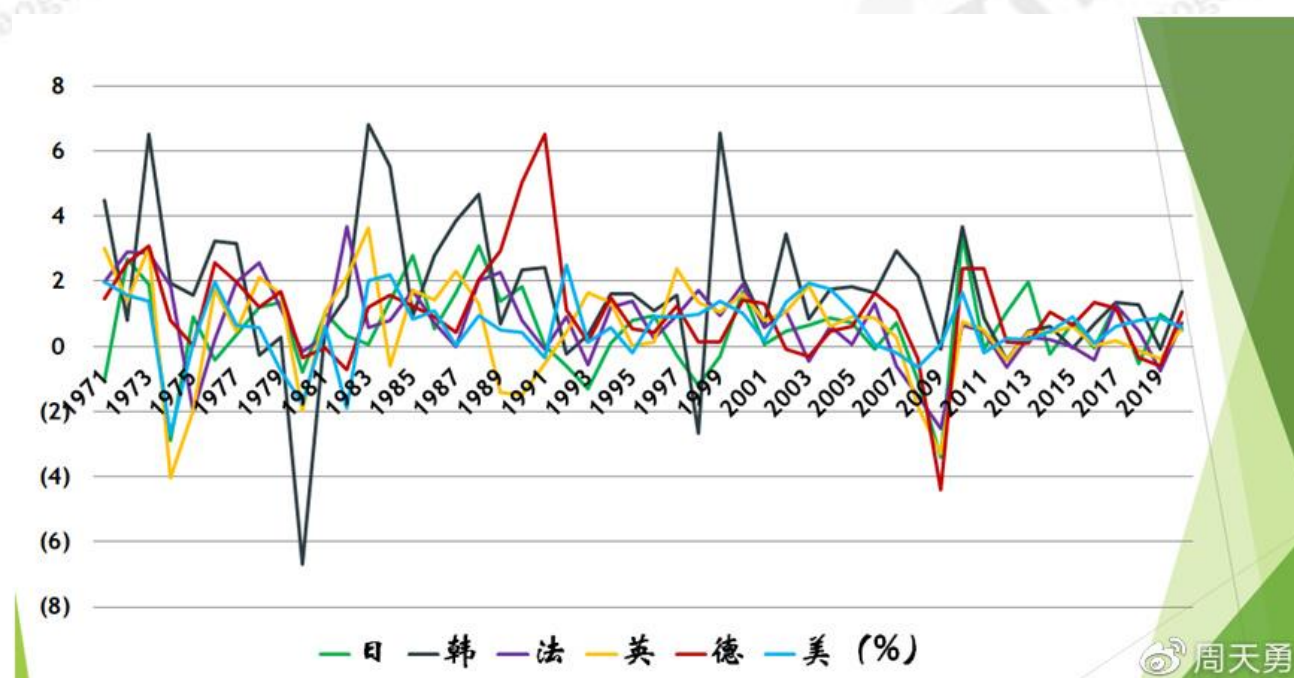
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支撑不了合理经济增长速度

索洛模型前面有一块是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我们未来要达到年均增长速度 4.73%，除了投入产出部分，要使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年均从改革开放以来的 0.7% 提高到 3.28%，如果要增长 5.5%，则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增长 4.05%，而如果要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提高到增长部分的 80%，则年均增长速度要提高到 4.35%。

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认为可能性很小。

1971-2019 年间，荷兰罗格宁根大学计算的数据，日韩法德英美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将近半个世纪。日本平均年增长率是 0.51%，韩国是 1.69%，法国 0.72%，英国 0.58%，德国好一些 1.05%，美国是 0.59%。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占 GDP 比例日本 21%，韩国 24%，法国 33%，英国 24%，

德国最好是 52.9%，美国 21%。没有看到这些发达国家 GDP 里全要素生产率部分能贡献增长的 80%，最好的就是 53%。可以看出近半个世纪中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最高的是韩国 1.67%，平均对 GDP 增长贡献比例最高的是德国 52.9%。中国 1957 年到 1977 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1.21，1978 年改革开放到 2019 年数据是 0.696%，占 GDP 比例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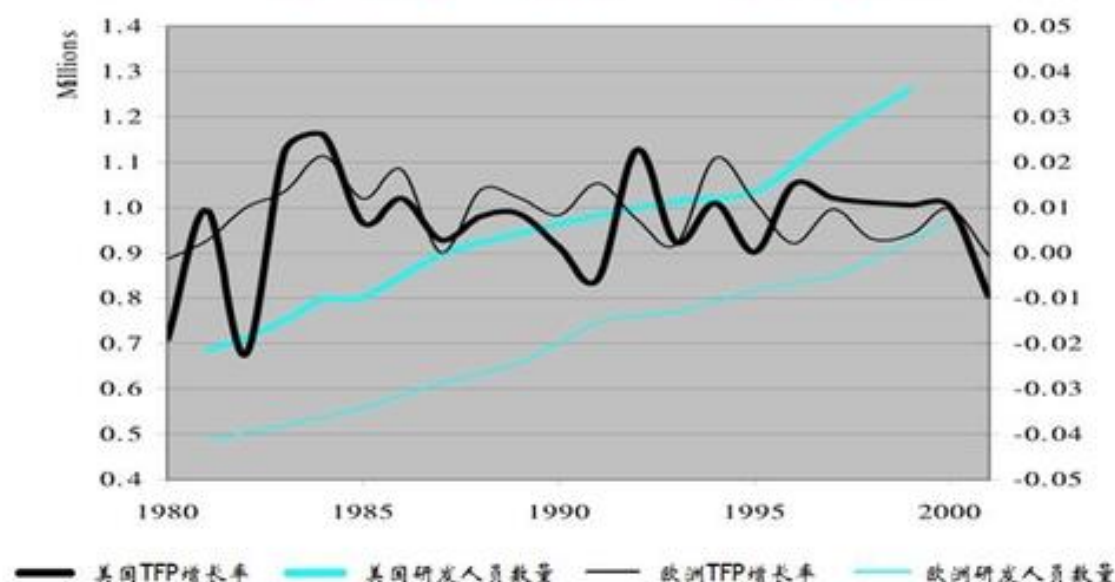


我这两年读了两篇论文，也是在研究时发现的。琼斯根据欧美 1980-2000 年研发人员数量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研究，发现研发人员向上向右的增长的曲线并没有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曲线的向上向右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长期平缓。

菲斯佩奇对此评论到，无论创新投入如何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一个平缓的趋势，而不是 J 型增长或者 S 型增长状态。从前面的数据看，日、韩、法、德、英美都在 0.5%-1.0% 之间，除了韩国高一些，未来 15

年中国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增长速度能够达到德国 1%的水平吗？能够达到韩国 1.69%的水平吗？能达到超过他们，比如达到 2%的水平吗？我觉得希望不大。

欧美研发人员与TFP增长对比



文献来源: Jones, C.I. 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2): 495-525.

巴特·菲斯佩奇: 创新与经济增长. 牛津创新手册. [A]. 法格博格·J., 莫利·D., 纳尔逊·R.R. 牛津创新手册 [C]. 柳玉林, 郑刚, 苗雷等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494-499.

周天勇

如果有我们会指数和 S 型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想法，影响推动增长的决策，则可能会有较大的风险。

三、财政货币政策在支撑合理增长方面治标不治本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凯恩斯觉得原因是总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了，原因就是消费者有货币持有偏好，投资者看悲有储蓄偏好，导致国民经济循环中流动性不足。因此，在萧条的时期，凯恩斯的想法就是你得搞财政赤字，扩大货币供给，注入流动性。流动性不足导致了实际的经济增

长速度达不到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哈罗德—多玛增长和钱纳里双缺口等模型，特别是前一模型，在工业化初或工业化中期，资本边际收益率比较高的时候比较适用，但是现在也不适用了，加大投资这些增长模型的建立。

我觉得中国的增长潜在在什么地方？我认为看 1957 年到 1977 年与 1978 年到 2021 年对比以后，要素投入大幅度的下降，但是产出年均增长 9.24%。我认为在体制，过去那个体制中生产要素、消费潜力和财富价值等，浪费闲置淹没低利用等规模太大，禁锢在体制扭曲中。这种体制扭曲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的。比如财政政策能解决户籍问题吗？货币问题能解决国有企业资本产出低效率问题吗？它解决不了。因此，我觉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是稳定增长的配角。

1978 年到 1992 年启动的两次高增长，主动力是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对生产、消费和价值能力的释放。2001 年启动的高增长主要是开放外贸体制，与国际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改革，还有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推动的。其中，2009 年我们用了 4 万亿刺激，这确实是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但到 2012 年以后增长速度还是跌到了 8% 以下，还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和下行压力。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我们今天要防止的是什么呢？如果是特大力度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结果可能会造成滞胀的局面。

四、市场化改革才是支撑经济合理增长的唯一出路

